对朱熹《阴符经考异》的再考察

王宗昱

号称朱熹撰写的《阴符经考异》在清代以后逐渐受到世人的重视。最近十年来也有不少人利用它讨论朱熹的思想。但是，考察它的出世经过的文章并不多见。2002年，王铁先生在校点这部著作的时候曾经做过比较深入的考察。2009年又有杨燕对此做过新的探索。本文试图做一点小小的推进。

一、《朱子成书》本的结构

王铁先生的贡献在于指出“阴符经考异”这个名目首次见于《朱子遗书二刻》[[1]](#footnote-1)。他也指出了黄瑞节《朱子成书》是把这部著作作为蔡元定[[2]](#footnote-2)的著作收入的。《朱子成书》对于我们揭开朱熹“考异”工作之谜有重要的价值。《朱子成书》被收入中华再造善本[[3]](#footnote-3)，所以目前人们很容易见到这个版本。在这部文集的目录里没有出现“阴符经注”或者“阴符经考异”等名目，仅仅称作“阴符经”。下面注明：“唐李筌述，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解，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校正。”显然，朱熹在这个文献里的作用是次要的。这三个作者及其著作性质的表述当然是由编纂者拟定的，例如“李筌述”这样的表述就是很主观的。《朱子成书》告诉我们后代被认定是朱熹作品的《阴符经考异》是在蔡元定注解的基础上加工成的。王铁根据《朱子成书》就足以证明《阴符经考异》的注释部分是蔡元定所作了，无需我补充证据。我会在下文里指出蔡元定的注释还在独立流传。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朱子成书》本，它的内容还是比较复杂的。我把它分为几个部分。

　　１，《阴符经》经文。《阴符经》有所谓三百字和四百字两个传本之说。黄瑞节在附录里指出：

骊山老母注本与蔡氏本，“我以时物文理哲”为书之末句。褚氏本与张氏注本其下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政在此内。今取褚氏本为正。

　　黄瑞节采用了四百字的经文，而且这是揣摩了朱熹的意思，表现出他编辑这个文本还是要宣传朱熹。

２，蔡元定的文字：序言，注解文字。后代有人写作新的注解时特别节选了蔡元定的序言。也有人引用时候说它是朱熹的话。王铁特别指出序言应该是蔡元定的文字。王应麟（1223—1296）的《玉海》引用了这个序言，明确说是“蔡氏序”，只是文字不完整，也没有时间记录[[4]](#footnote-4)。在《朱子成书》本里，《阴符经》注解的主体是由蔡元定的注释支持的。黄瑞节为什么要选取蔡元定的著作呢？黄瑞节在蔡元定序言后的长篇附录里说道：“蔡氏学朱氏者也，故当为一家之说云。[[5]](#footnote-5)” 《朱子成书》收录了十部著作，有三部是蔡元定的作品。另外两部是《律吕新书》、《皇极经世指要》。黄瑞节在《律吕新书》附录里说：“《律吕书》盖朱蔡师弟子相与成之者。”黄瑞节把蔡元定的著作看成和朱熹切磋协商下的成果。至于蔡元定和朱熹的关系以及蔡元定在南宋末年儒生中的形象尚需进一步探讨。总之，黄瑞节在《朱子成书》里对蔡元定著作权的认定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这几部蔡元定原著的作品在后世都被许多人认为是朱熹的作品[[6]](#footnote-6)。

　　3，附录。黄瑞节在《朱子成书》的“凡目”里说：“附录以朱子为主。他书之互见，同时之说明，门弟子之难疑，后来之阐说，俱附焉。”可见附录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仅是朱熹本人的论述。就《阴符经》这个部分来说，附录可以分为三类：朱熹的言论，其他学者的论述，黄瑞节本人的说明。朱熹的语录总计十一段，大多都见于《朱子语类》[[7]](#footnote-7)，显然是黄瑞节从朱熹著作中挑选出来的。这十一段文字有四段附录在蔡元定序言后面，有四段附录在经文“自然之道静”下面。

黄瑞节引用的各家文字出自邵雍、二程、高似孙、魏了翁、欧阳守道、须溪刘氏[[8]](#footnote-8)。黄瑞节选取这些文字有两个背景。一方面是利用邵雍以来的理学家言论与朱熹的思想融为一体。另一方面是照顾到黄瑞节本人的交际圈。刘辰翁的儿子刘将孙为《朱子成书》写了序言。欧阳守道和刘辰翁是师徒关系。

黄瑞节的文字一部分是交代不同版本的经文出入，一部分是阐发经文义理。他的文字对于加强全书的系统性有很重要的作用。黄瑞节本人的生平很难找寻。现在只找到了他本人的一篇文章和刘将孙给他写的一篇文章[[9]](#footnote-9)。目前只知道他是江西安福（今有安福县）一个地方文人。他曾经被委任去外地任学正，但是拒绝了。元朝统一南方以后，他闭门不出。他在历史上被纪念就是由于编辑了《朱子成书》。

二、蔡元定注本的流传

现在道藏内有一部“蔡氏注”的《黄帝阴符经注》。所谓“蔡氏注”意味着编者不知道作者。王铁已经指出了它和邹本的关系。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朱子成书》，那么把它认定为蔡元定的著作是没有问题的[[10]](#footnote-10)。当然，道藏的编纂者也没有发现这个作品和邹作品的相似关系[[11]](#footnote-11)。这个本子没有序言。分为上中下三篇。这个结构和经文、注文都接近《朱子成书》本。有个别错字。也有修改痕迹[[12]](#footnote-12)。它应该是一个独立流传下来的本子。

王应麟见过蔡元定的注本。《困学纪闻》第七卷有一段文字：“阴符经：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蔡季通释其义曰：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西方论六根六识，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这段话可见于道藏本蔡氏《黄帝阴符经注》和邹的《黄帝阴符经注解》，只是中间缺少一段孔子的话。如何看待它缺少了这句话？是刻意删去了，还是出自不同版本？和黄瑞节同时代的刘因（1249—1293）在《静修集》里批评蔡元定的注释：“蔡氏中篇所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说，若非正学之语，而有害夫道者。岂蔡氏早年之说耶？”刘因的理学立场是很强势的。他也自然知道蔡元定和朱熹的关系。他看到的也应该是一个独立流传的蔡元定注本。道藏蔡氏注本的存在证明蔡元定的著作至少在元朝还是独立流传的。不过，我们在现存古籍目录里看不到蔡元定注本的记录。现在国内的图书馆还是有存本的，但是或者被记录为蔡氏，或者误记为蔡望[[13]](#footnote-13)。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图书的蔡氏本被最近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记录为蔡望所作[[14]](#footnote-14)，实际上是选取自道藏的翻刻本，所以署名还是蔡氏。我目前还没有看到道藏以外的明清时代的传本，虽然直至乾隆年间还有人提及蔡元定的注本[[15]](#footnote-15)。

三、“朱熹注本”的形成过程

黄瑞节没有假造朱熹注本，但是在黄瑞节以前世上是有“朱熹注本”流传的。俞琰（1253—1314）[[16]](#footnote-16)明确记载了朱熹注释《阴符经》。俞琰留下的最确凿的证据是他引用的时候明确说“朱紫阳”云云，而且这段话应该属于蔡元定的文字。这说明俞琰看到的本子是以朱熹的名义流传的，而且抹杀了蔡元定的著作权。所以，俞琰见到的本子和《朱子成书》本肯定是不同的。

俞琰本人所作《黄帝阴符经注》经文为三百字本。他在篇末说：“终篇又有百余字，或以为注文，或以为本文。如云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谓天地间阳盛则胜阴，阴盛则胜阳。如水之浸物，盖以渐也。朱紫阳虽以为注文而不解注，然答门人之问则深取其说。愚故并及之。”“不解注”这三个字需要揣摩。首先，俞琰所见的朱熹注本是否有这百余字？我不能肯定。其次，俞琰所见朱子注本显然没有对这百余字的解释性文字。《朱子成书》是有这样的解释文字的。这是和《朱子成书》本的又一个不同之处，而且很重要。所以，俞琰所见朱子注本显然不是《朱子成书》本。所谓“愚故并及之”是说俞琰特别提到朱熹和门人的对话。如果这个本子里有这样的文字，就无所谓“并及之”了。

俞琰在《席上腐谈》里面提到一些《阴符经》的注释：“阴符经有李荃注、骊山老姥注、张果注、连高脚注、金陵唐淳李云峰注、储华谷注。朱晦庵亦有注。晦庵曰：阴符经恐是唐李佺所为，是他着意做，学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说起便行于世。向以语吕伯恭，亦以为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做自解文，字亦可认。”他提到朱熹有注释，却没有说蔡元定的注释。这应该是由于他没有见到过蔡元定的注本，甚至也没有听说过。他引用的这段朱熹的话也见于《朱子成书》，但是文字比《朱子成书》多，显然直接引自朱熹的著作。由这个差别，我也推测俞琰所见的本子里没有朱熹的文字。它自然也和黄瑞节的工作没有关系。我倾向认为俞琰所见的本子就是把蔡元定的注本直接当作了朱熹的作品。俞琰对蔡元定的易学很了解，却不知道他还有《阴符经》的注解。这很让我费解。我还要指出的是，俞琰和黄瑞节生活年代相同。《席上腐谈》卷下自叙他在1290年曾经到饶州（今鄱阳湖一带）。古人之间的隔绝是很严重的吗？

刘将孙给《朱子成书》写作的序言完成于1305年。我们目前无法知道日新堂1241年的本子是否初版本。我没有看到元代其他文献里关于《朱子成书》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明代以后黄瑞节的工作已经发生影响了，而且是反映在一个道士的著作里。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1359—1410）的《岘泉集》里有一篇《辨阴符经》，里面引用了几段话，都来自《朱子成书》本。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字出于序言和附录，也可以看到那段关于“二十一句”的话也提到了。可以说张宇初看到的是完整的本子。其中一句值得我们考虑：“朱子之疏正以其词支而晦，吾恐人见其支而不见其一也。[[17]](#footnote-17)”《朱子成书》本的序言原文云：“吾恐人见其支而不见其一也，见其晦而不见其明也。”所谓“朱子之疏正”意味着什么呢？《朱子成书》明确说是朱熹校正。“疏正”也有这个意思。可是，张宇初没有提到蔡元定，却直接把蔡元定的序言当作了朱熹的文字。我没有根据说张宇初阅读的是一个单行本。国家图书馆现存有据说是明代初年印刷的《朱子成书》。张宇初把序言文字看作是朱熹的话自然是他过于迷信朱熹的影响了。

正统道藏里有一篇署名“崆峒道士邹注”的《黄帝阴符经注解》。这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以朱熹个人名义的《阴符经》注解。这个本子除了缺少蔡元定的序言以及序言之后的长篇附录，全部文字和《朱子成书》本一致。其中有一些错字，所以它没有优于其他版本的地方。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残本，而偏向把它看作一个改编本。说它是改编一是因为它缺少序言及其附录，二是它修改了经文。表面看，缺少经注之前的文字有可能是流传过程中丢失了，但是在其他地方还有附录文字被删除了。这个本子不仅有经文被修改，也有注文和附录被改动。例如“予”被改成“余”，“老聃”被改成“老子”。这个本子没有使用《朱子成书》“校正”或者 “疏正”的表述，而是明确说“崆峒道士邹注”。崆峒道士邹这个名字曾经被朱熹用来注释《周易参同契》[[18]](#footnote-18)。有人使用这个化名来对《朱子成书》本的原貌做改造。书名和作者都改变了。

在正统道藏里有署名“朱熹注”的《周易参同契》，同时还注明“黄瑞节附录”。对比之下，这部崆峒道士的作品没有注明黄瑞节附录。因此，我认为这个作品在被收入道藏的时候没有被辨认出它的来历。我也不能断定有黄瑞节附录的《周易参同契》是否直接选自《朱子成书》。张宇初一直被看作参与了正统道藏的编纂的。虞万里对此提出异议[[19]](#footnote-19)。我也同意《岘泉集》里的文字和道藏的编纂没有直接的联系。张宇初看到的本子应该不是改编本。他的《辨阴符经》给我们留下了很重要的参考资料，使我们看到《朱子成书》的内容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利用着。

王铁先生已经指出，“阴符经考异”这个名目初次见于清代初年的《朱子遗书二刻》。北京大学收藏有多部康熙年间（1662—1722）的《朱子遗书》。我也见到有两部《朱子遗书》的后半部题为“朱子遗书二刻”。《朱子阴符经考异》的确在《朱子遗书二刻》部分。牌记写着“御儿吕氏宝诰堂重刻白鹿洞原本”。这是清朝初年吕留良印刷的。有学者指出“御儿吕氏宝诰堂”是康熙八年至十九年（1680）在家乡（今浙江桐乡）的刻书场所。吕留良去世（1683年）以后，无人敢于使用这个名号[[20]](#footnote-20)。牌记上说了是根据白鹿洞的“原本”，所以“朱子阴符经考异”这个名目不是宝诰堂取的。

“二刻”内容单列目录。最后一项是“阴符经注”。在正文，题目写作“朱子阴符经考异”，同时注明“庐陵黄瑞节附录”。目前这个版本给我们的信息是：注释是朱子所作，附录部分是黄瑞节所作。和《朱子成书》相比，除了有两处异文，《朱子遗书二刻》还把附录部分冠以“附”字。这或许是因为《朱子成书》本附录文字为双行小字，而《朱子阴符经考异》附录部分不是双行小字。冠以“附”字表示为黄瑞节编辑的文字。那处异文似乎是《朱子阴符经考异》的定本者根据通行本的《尚书》校改《朱子成书》[[21]](#footnote-21)。所以，我也把《朱子阴符经考异》看作一个改编本。这个改编者不仅校对了文字，重新排版，更重要的是给这部书取了新题目，明确是朱熹的著作。

我们再把这个本子和四库全书本作比较，就会看到四库全书很可能是以这个本子作为底本的。我们看《四库采进书目》[[22]](#footnote-22)里有三处记录了《朱子遗书》，而没有记录《朱子成书》。我认为四库全书的《阴符经考异》取自《朱子遗书》。我的根据不仅是由于四库本遵从了《朱子遗书》本的异文，而且遵从了它对附录的编排，给附录文字冠以“附”字。只是直接称“阴符经考异”，而不冠以“朱子”二字。四库全书收编吕留良刻印的《朱子遗书》本当然对于扩大《阴符经考异》的影响有重要作用。但是，《朱子遗书》在历史上的发行量很大[[23]](#footnote-23)。因此，《朱子遗书》本的《阴符经考异》在四库全书编修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我现在缺少从正统道藏的邹本到明末清初《朱子遗书》期间是否有材料说明世人如何确信朱熹注解了《阴符经》。《朱子遗书》说明至少在清朝初年，朱熹注解了《阴符经》这个信念已经被儒生们接受了。姜任修在乾隆九年（1744）刊行了他写作的《阴符经口义》。在正文前面有一篇“原序”，实际就是蔡元定的序言，但是在文末却写着“新安朱氏序”。这几个字他从哪个传本抄来的？还是他自己加上的？他还在后序里面称赞某个本子“遵用朱義，其近道矣”，可见他对朱熹有阴符经的注解是深信不疑的。《阴符经考异》使得人们对于朱熹和《阴符经》的关系不再含糊其辞。

综上所述，我把所谓朱熹注解《阴符经》的这个神化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朱子成书》以前，大约只是简单地把蔡元定的注释直接当作朱熹的著作。不过我没有实物的证据。第二个阶段是黄瑞节将蔡元定和朱熹的文字编辑在一起并增加附录的形态。这个编辑对以后的传本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它承认蔡元定的著作权。第三个阶段，是以道藏本为代表的邹本，改编了黄瑞节《朱子成书》本，抹杀了蔡元定的著作权。现存古籍善本目录里的邹本都是明代出版的。第四个阶段，在清代初年甚至明代，出现了署名朱熹的本子，书名也改成了《阴符经考异》。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力量在发生作用。一方面是将蔡元定的文字看作朱熹所为。这或许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蔡氏和朱熹实际为一家，从而不看重蔡氏的著作权。朱熹的威信发挥着霸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朱熹曾经有一些评价《阴符经》的言论。这些言论受到后代理学家的崇拜甚至夸大朱熹在《阴符经》方面的工作，相信朱熹有注解传世。这两个因素在黄瑞节的编辑工作里面都有表现。

最后，我想对黄瑞节这个传本系统作一个评价。首先，它提供给我们一个蔡元定的注本。这个注本比道藏内蔡氏本要完善。其次，黄瑞节对于《阴符经》的流传以及注本有比较多的了解。他在附录里的介绍值得我们在研究《阴符经》流传历史乃至版本时候加以参考。例如，他援引李筌的文字可以校正道藏内的李筌《黄帝阴符经疏》。他几次提到《阴符经》骊山老姥注本，值得我们对照历代艺文志的记录进一步考察。黄瑞节这个传本系统是由对朱熹的崇信支配的，还值得继续探讨。例如为什么书名没有黄帝二字？是否有抵制黄帝神话的潜在力量？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

1. 见《朱子全书》第13册，第5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联合出版。这部书不仅根据《朱子成书》收入了《阴符经注》，而且明确指出《阴符经考异》来自蔡元定注本。 [↑](#footnote-ref-1)
2.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先生。曾经向朱熹学习，也受到朱熹（1130—1200）的极大尊重。事迹可见南宋李幼武补编的《宋名臣言行录》外集第十七卷。 [↑](#footnote-ref-2)
3. 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所用底本为铁琴铜剑楼旧藏元至正元年（1341年）日新堂刊本。此书刘将孙序言作于1305年。 [↑](#footnote-ref-3)
4. 如果根据王铁的现代标点，《玉海》引文有腰斩之嫌。这也是一个有疑问的地方。此外，乾隆时徐文靖《管城硕记》第十九卷里说到“蔡西山曰此书即李筌所为也”。在我们今天看，序言里这个说法似乎并不是蔡元定本人的观点。 [↑](#footnote-ref-4)
5. 见《朱子全书》第13册，第509页。 [↑](#footnote-ref-5)
6. 也有人反而认为《周易参同契考异》的写作有蔡元定参与。根据《朱子成书》，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参见陈国代《朱熹委托修书之举隅》，刊于《武夷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footnote-ref-6)
7. 据四库提要，《朱子语类》的最后编订在咸淳庚午（1270）年。 [↑](#footnote-ref-7)
8. 须溪是刘辰翁的别号。他的儿子刘将孙在世时就被称为小须。日新堂版《朱子成书》刘将孙序言后有“须溪刘氏”印。不过明清时代都有人认为黄瑞节选取的是刘辰翁的文字。例如清人朱彝尊《经义考》。 [↑](#footnote-ref-8)
9. 黄瑞节：《祭御史萧方厓文》，《天下同文集》卷三十四。刘将孙：《送黄观乐连州学正序》，《养吾斋集》卷十四。均有四库全书本。 [↑](#footnote-ref-9)
10. 杨燕的文章反对这个结论。杨燕：《〈阴符经考异〉作者非朱熹、蔡元定蠡测》，《泉州师范学报》2009年第1期，第36页。 [↑](#footnote-ref-10)
11. 这一点曾经有德国学者常志静（F. Reiter）和施密特（Hans-Hermann Schmidt）指出过。K.Schipper & F.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pp.695, 69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最近有陈茉的论文《关于〈黄帝阴符经〉蔡氏注本和邹注本作者的考证》讨论这两篇的关系。见《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 [↑](#footnote-ref-11)
12. 《朱子成书》本经文写作“至净性廉”，注文云：“至净者无染”。蔡氏本经文沿袭传统的“至静性廉”。蔡氏本又将“气”写作“炁”，不同于《朱子成书》和邹本。当然，这些都还可以继续谈论，不必遽然下结论。 [↑](#footnote-ref-12)
13. 蔡望为北宋人。《玉海》记其于咸平三年（1000）“进注《阴符经》”。 [↑](#footnote-ref-13)
14. 《中国古籍总目》子部，第2436页。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联合出版。 [↑](#footnote-ref-14)
15. 徐文靖《管城硕记》卷十九云：“蔡西山曰此书即筌所为也”。 [↑](#footnote-ref-15)
16. 四库提要认为俞琰生在南宋宝祐初年，卒于延祐（1314年改元）初。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里提出批评。他似乎认为俞琰出生应该早于1253年（宝祐元年）。见《四库提要辨证》，第20页，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俞琰《席上腐谈》卷下自叙至大辛亥（1311年）在饶州的见闻。我认为四库提要的记录可信。见中华书局1965年版《四库全书总目》，第20页。 [↑](#footnote-ref-16)
17. 张宇初改变了原来句子，试图表达自己的意思。 [↑](#footnote-ref-17)
18. 俞琰《席上腐谈》卷下讨论《参同契》版本时说：“朱晦庵尝托崆峒道士邹之名为注。邹即朱，春秋邾子之国也。又作考异。”和俞琰同时代的俞德邻在《佩韦斋辑闻》里说：“朱文公解《周易参同契》而云邹。释多不晓其义。闻之先辈谓：邹本春秋邾子之国，朱其后也。《乐记》读为熹。谓之邹，实文公姓名也。”朱熹嫡长孙朱鉴编辑的《文公易说》里也有相关材料证明朱熹使用了空同道士邹的名义作了《周易参同契考异》。 [↑](#footnote-ref-18)
19. 虞万里：《正统道藏编纂刊刻年代新考》，《榆枋斋学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footnote-ref-19)
20. 徐德明：《吕留良宝诰堂刻书考述》，《上海图书情报学刊》，2001年第4期。 [↑](#footnote-ref-20)
21. 另一处异文是校改了《朱子成书》本中“强兵战胜之诀”。“诀”既与通行说法不同，也和上下文不谐调。 [↑](#footnote-ref-21)
22. 吴慰祖校订，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它记载了为编修四库全书从各地征集来的图书目录。当然，它也不是很完备的。例如《阴符经考异》，提要说明是根据江西采进本，但是《四库采进书目》里江西书目没有记录《朱子遗书》。 [↑](#footnote-ref-22)
23. 也不排除宝诰堂以前和以后都有《朱子遗书》的其他印本。北京大学收藏有宝诰堂印本六部，还有两部光绪年间的传经堂刻本。由于我没有找到白鹿洞的相关资料，所以我不能判断所谓白鹿洞“原本”的社会影响。因此，我这里评价吕留良刊本的影响也是不够恰当的。 [↑](#footnote-ref-23)